本版编辑：沈　辉
E-mail：t3@studytimes.cn
Tel：010—62806418

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引领中国进入新黄金时代

——《习近平复兴中国》连载

□〔美〕罗斯·特里尔　主编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30多年后，如今走到了一个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人口、环境和资源瓶颈约束显现，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如何引领中国经济助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需要习近平拿出新版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气魄宏大、布局完整、主攻点明确，这一改革战略组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发力点，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要支撑，以创新为最主要的驱动力，共同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的。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强调创新导向，重视发挥智库作用，特色鲜明，富有时代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破析中国改革之困，将引领中国进入新的黄金时代。

习近平经济改革方略为历史贡献“强国策”

2015年6月，由美国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简体中文版面世，并引发热议。

这本书总结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国家兴衰史，认真分析了一些困扰人类几十个世纪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穷？为什么有些国家富？为什么有些国家先穷后富？为什么有些国家先富后穷？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结论很简洁：当一个国家采取了适当的支持增长的政治制度时，该国就能崛起；而当这些制度僵化或者不适当时，该国就会失败。

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却给予高度评价：两位作者非常有说服力地表明，一个国家只有具备适当的经济制度时，才能够脱贫。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他们主要贡献的核心，这已经得出了一项关于这个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问题的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

将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考虑，理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有重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就曾专门组织干部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早有洞察……毛泽东先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战略等，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突破教条式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模式。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等，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辟了新道路。

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善于将政治与经济统一起来考虑，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综合统筹，不断变革创新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使之达到最大限度解放生产力、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可以说是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和理论逻辑，这一独特的治国理论甚至可以称为“改革学”。

中国需要新版政治经济学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盛赞其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邓小平将这一改革理论成果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初稿”，既赞扬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拿出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富有启迪的政策思路。当然，称其为“初稿”就意味着还有不断改进的空间，这其中也饱含着邓小平对后来的中国改革家将之臻于完善的殷切期待。

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衔枚疾进，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成果。但随着世界金融危机蔓延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当代中国经济的规模体量、内外环境的纷繁复杂，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经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各种矛盾问题亦不断积累交错。特别是出现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源、劳动力和环境约束日趋严峻，国际经济需求长期疲软等新的尖锐矛盾，过去以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为主动力的经济运行机制日渐失灵。对新阶段的中国经济改革形势怎么看？中国经济改革该怎么干？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紧盯着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是否能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

香港《南华早报》评论说，近年来中国经济以超乎预期的速度放缓，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25年最低，这使外界担心中国是否会陷入漫长的低增长期，即“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型，比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更为复杂。“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战略在过去30年里非常成功，但用于今天的发展却不一定有效”。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也发表文章分析称，中国30年来的发展奇迹展示的是这个国家作为终极生产者的超凡能力。然而，这种生产模式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该模式容易导致储蓄过剩、投资过度、无限制的资源需求和环境恶化，找到一种新模式势在必行。

显然，推出新版本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命题摆到了习近平面前。

“新教案”人民味很足

要写出新版政治经济学教案，最重要的就是准确判断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引领中国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在把“新常态”作为经济改革理论基础提出6个月后，习近平在2014年11月9日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

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所以，提质增效是新常态的本质。新常态的指向是国民生活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提升，就业稳，价格稳，民生保障更完善。

习近平作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战略判断后，基于新常态的系列改革战略接踵而出：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的资源配置思想；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思想；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和调控思想；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相互协调思想；

“新农合”与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三农”思想；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等新型城镇化思想；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思想；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精准扶贫”思想；

……

习近平这些改革思想和主张，特别强调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经济理论，使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学”既坚持问题导向，又突出适合中国难题的改革思路，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提供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导。

恩格斯曾说过，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学科。也就是说，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传统，任何改革主张都将是脆弱无力的。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还要深化、丰富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尽早形成能够指导新常态下中国改革的“新版政治经济学”。

尽管尚处在起步完善阶段，习近平主导制定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已经显示出许多超越西方经济体制的制度优势，但国际国内许多人囿于对西方市场经济学说的迷信，先验地认定只有“华盛顿共识”这一唯一的西方市场经济形态才是终极真理。事实上，观察习近平的全面改革方略和推动中国制度创新的崭新实践，是学界的一种共同责任。打造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能解释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为世界经济开辟新路的现实需要。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道”与“术”之别，所谓“道”是指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等形而上的概念，而“术”则是具体实现的手段、方法和路径等。

如果仅从“术”的层面解析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一定意义上确实存在与西方经济学相合的地方，而如果从“道”的层面来判断，其中的旨趣就大相径庭了。

强调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服务人民，这可以说是习近平倡导的政治经济学新教案的内核。

习近平在2015年11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的这一论述，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民本情怀。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还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作出明确界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

习近平强调，要高度重视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要忘记发展的“共富目标”，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如此，他还在“十三五”规划说明中特别强调，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全面建成中国的小康社会，这也体现着把造福人民作为发展的目的、一切为了人民的中心思想。比如协调、绿色、共享，就是如此。协调和共享，是为了解决“一切为了人民”中的短板问题；绿色，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问题。习近平从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上强调把造福人民作为发展的目的、一切为了人民，体现了其经济思想的鲜明民本特色。

2016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恳切地谈及要关照工人阶级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工的经济利益。他说，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

在这次全国“两会”上，习近平还专门参加了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与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代表谈心，他先为非公经济人士送上定心丸——要使有关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地落细落实。此前，习近平也多次表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他又语重心长地给权力与资本划出了一个隔离防线——对领导干部而言，“亲”就是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清”就是清白纯洁，不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来说，就是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习近平十分简洁地用“亲”“清”两字阐明了中国需要建立的新型政商关系，这为长期困扰中国非公经济健康发展的“权力介入资本”“资本腐蚀权力”架设了一道“防火墙”，有着深远意义。

引领中国实现历史跨越的“强国策”

2016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外媒纷纷注意到，“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成为舆论界一大热词。

新华社在此期间，用了8组关键词来解析“习近平政治经济学”：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坚持“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用好，积极适应“新常态”，以“供给侧”发力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战略思想。其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曾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现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的任泽平，是中国国内最早提出“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学者之一，任泽平认为，习近平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许多重要经济思想和理论成果。概括来说，“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可以归纳为以下“六论”：“新常态”论、“两手合力”论、“基本经济制度”论、“共同富裕”论、“人民主体”论、“五大发展”论。

不管是8组关键词，还是“六论”，都说明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实现了系统化和理论化。

2016年1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在中国《经济日报》上发表理论文章，高度评价习近平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改革和世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认为这是为丰富人类经济思想贡献的“中国智慧”。

张宇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丰富人类经济思想宝库，贡献了中国智慧，这是我们在经济领域中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

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为解决中国经济新阶段的问题而提供的解决方案，但这种中国特色，恰恰也是中国领导人为世界政治经济困局开出的新药方，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创新又是推动这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重要因素。亚当·斯密与19世纪英国的关系、李斯特与德国崛起的关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20世纪美国的关系，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从当下时代的最重要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前景未卜、出路不明；另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并且充满希望。”另一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邱海平则更看重“习近平政治经济学”对推进世界范围经济学提升的启迪价值，“这就意味着，产生新的经济学大师的时代到来了。新的经济学大师不可能从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或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人中产生。相反，大师一定是从能够批判地扬弃已有的两大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中产生。中国已经具备这样的条件”。

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是从中共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大历史时期。中国已经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确定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迈进。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壮举。“习近平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领导中国向全面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进的经济战略构想，这一引领中国从世界经济大国向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迈进的“强国策”，正在快速改写世界经济版图。

了解“习近平政治经济学”，一大诀窍就是看趋势和走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在参加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中国低于10%的经济增速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放缓。“不能拿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率来和当前的经济增速作对比，而要将中国放在全球的经济环境中来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高。相信在中国政府各项改革的推进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经济将会比肩欧美等发达国家。”

曾任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罗思义也专门在中国报纸撰文指出，为什么遵循“华盛顿共识”的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未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反而进一步落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罗思义希望中国不要被“华盛顿共识”催眠，而应当树立经济学自信——“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失败的发展战略。相反，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那些国家，并非基于“华盛顿共识”。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唯一的正确方法是实事求是。

（上接1版）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DNA，也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重要标志和根本保证。早在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95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不忘初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就是要明确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我们的现实努力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立足岗位，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现在，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中，我们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跑出接力赛的最好成绩。讲话强调，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因此，全党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关键要看这个道路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讲话再次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人，树立起健康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非常重要。

政治上的坚定来自于理论上的清醒。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当下，全体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特别是领会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信念坚定，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始终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真正做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